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丁永勤
值班责编：刘婧宇 实习生薛清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 88051377

闽西：长征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

在整个闽西百多万革命群众中除老少外，强壮的男女红军，赤卫队的后备军队，少年先锋队，二十万人以上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踏上长征路的近3万福建籍红军仅剩下2000余人。宁化仅存58人

本报记者郭奔胜 孟昭丽

翻开今天描写红军长征史的著作，在这些或亲历者第一时间回忆、或党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有个这样一个地方，虽然着墨不多，但在长征史中却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地方就是：闽西。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的热播，将这段悲壮的历史掀开了一角：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主要由闽西客家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总后卫，在湘江一役几乎全部牺牲……

“一方面，这段历史主要发生在长征前期和初期，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虽然参加长征的福建儿女约占三分之一，以闽西最多，但因牺牲惨烈，长征胜利时多已化为忠骨，留下来，能描述这段历史的人少之又少。”一位党史专家如此解释“这段不被熟知的历史”。

“快快扩大我红军”

36岁的林海鑫是在“红军故事”中长大的。“爷爷兄弟三人先后参加红军，其中二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故事来自于奶奶张冬莲。

张冬莲是上杭县才溪乡远近闻名的“铁娘子”，曾带领才溪妇女为红军战士做布鞋，上山布“竹笠”暗器，助红军打仗。

“奶奶103岁去世，90多岁时还能双手舞大刀。”林海鑫说。

翻开上杭县《英烈名录簿》，“英雄三兄弟”记载在内，他们是：林仲森、林仲德、林仲达。

林海鑫告诉记者，当时的情景是：1929年，兄弟三人中的大哥、27岁的林仲森带头报名当红军。24岁的弟弟林仲德急了，说，“哥，你年纪较大，留下娶老婆，当红军我去最合适。”最小的弟弟林仲达更急了，说，“不行，你们都留下，我已经15岁了，人长得和你们一样高。我去最好。”

最后，兄弟三个先后都参加了红军。
来自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数字显示：“上才溪全部青年男子(16到55岁)554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0%以上。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26人，也占70%。”

据统计，在才溪乡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4人当红军的有7户，6人当红军的也有一户。父子当红军的有9户，兄弟当红军的有231户，叔侄当红军的有6户，夫妻当红军的有9户。

“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才溪乡百个人有八十八人当红军去了。”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曾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如此高度评价。

《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一书中写道：“在整个闽西百多万革命群众中除老少外，强壮的男女红军，赤卫队的后备军队，少年先锋队，二十万人以上。”

闽西苏区，位于福建的最西边，主要包括龙岩的上杭、永定、连城、武平、长汀和三明的清流、宁化、明溪等县，独特的山险条件使这里形成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格局”。

正是在这片红土地上，长征出发前，展示出一幕幕“青壮年争先恐后上前线，年迈的父母送子、新婚的妻子送郎当红军”的感人景象。
“红军在这里实现了整建制的扩编，这是在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福建省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钟健英说，仅在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就先后组建了红九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二十一军等，并为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扩编输送了大量的兵源，总数在两万以上。

一张老照片中，今人可以看到：广大苏区青壮年在“前方炮火连天响，扩大红军莫迟延；快快扩大我红军，巩固红色我政权”的歌声中，源源不断地加入红军中去，组成了一支支骁勇善战的铁军。

在宁化，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扩红模范区东口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先后将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自己还表示：“可惜我太老了，不然我也上前线去消灭敌人。”

长征史上保留的一组数字更显示了闽西儿女高涨的参军热情：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及中共机关共86000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



▲长汀县南山镇文化馆工作人员赖富家中复村红军旧址讲着解红军长征故事。(9月11日摄) 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在距离松毛岭不远的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观寿祠前，红九军团举行万人誓师会后开始战略转移，成为中央红军率先长征的一支队伍。(9月11日摄)

“青山处处埋忠骨”

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在长征队伍里，近3万名为福建儿女，约占三分之一。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永定、连城、建宁为最多。

“闽西对长征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人力。”钟健英说，长汀、宁化两个县，是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中央苏区县。

“红色粮仓”与“红色小上海”

1987年到2005年，张族进花了8年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希望对《宁化地方志》进行完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增添“革命老区特记”。

“很多年轻人对宁化作为长征出发地这段历史并不了解，一直没有一份特别完整的资料。”曾任宁化县志办副主任的张族进说，都是抢救活资料，亲历当年历史的红军老人已所剩无几。

“第一次撰写县志时，老红军王荣高带着大家，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第二次修志时，许多红军老人已离开人世。”张族进说。

从这份还未出版的“特记”里可以看出，“只有13万人口的宁化县，参加红军人数多达13777名，平均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每3户就有1户是红军家属。”

“特记”中还写着：宁化为财力、物力支援苏区红军最多的县，每年向苏维埃中央政府提供“千担纸、万担粮”，被誉为中央苏区“乌克兰”。

实际上，地处武夷山麓的宁化县，低山、丘陵、盆地占全县总面积的96%，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的说法。历史上由于土壤肥力差且水力资源缺乏，当地农民只能以“地瓜当饭饱”。

土地并不肥沃的宁化，为何会成为中央苏区“乌克兰”，更被后人称为“红色粮仓”？

“靠的是好政策，以及当地人民火热的革命传统。”张族进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粮食生产，鼓励垦荒、整顿水利，成立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焕发出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宁化原有荒田达2万多亩，迅速大部化为良田，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从1934年宁化县的征粮情况便可知“当地人民支持革命的热情有多高”。1934年2月，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宁化县就收集粮食3万多担，现金3.7万元，成为中央苏区收集谷子最多的县份之一。

与此同时，与宁化交界的小山城长汀也创造出了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的奇迹。

红军进入长汀之前，此处“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后，实行“搞好经济工作，建立产业银行”，鼓励群众自办各种信用合作社，一时间，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航运发达。

在长汀县博物馆，当年的纸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票合作社等股票一一陈列，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还有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合作社，这里曾诞生过红军的“第一套军服，为红军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物资”。

“那时这里有一大批的公营工业。”长汀县党史专家康庚生说，有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等，支撑起中央苏区的骨干工业体系。

从当地的史料里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中华苏维埃银行福建省分行、闽西工农银行、对外贸易分局等，以保障和促进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钟健英说，当时瑞金是中央苏区的政治中心，而这里则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汀南山镇中复小学校园干净敞亮，十几名骄傲的“红领巾”围绕老师身旁，齐声朗诵《七律·长征》。

刚刚踏上漫漫求学路的他们，对“两万五千里”也许只有模糊的数学计量概念，却个个了解“长征起点”在家乡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学校所在的中复村被称为“红军长征第一村”，毗邻村东的松毛岭，东接龙岩、上杭，西通长汀、瑞金，是中央苏区的东线门户。

1934年9月23日，时值中秋，硝烟笼罩着地势险要的松毛岭，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快要守不住了。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松毛岭打响长征前保卫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战，这场仗打了七天七夜，“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民间还流传着一种记忆：打到第6天时，当地老百姓为战士们做饭，亲眼看着给前方送饭的红军炊事员挑着满满的饭桶出发，又挑着满满的饭桶回村，一边哭喊一边走，“班长，不得了了啊，饭送过去没人吃！部队糟了！”

战士们用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集结和转移时间。9月30日下午3点，在距离松毛岭不远的中复村观寿祠前，举行万人誓师会后，红九军团开始战略转移，成为中央红军率先长征的一支队伍。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当地88岁的老人钟宜龙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漫山遍野收捡遗骸，为无名烈士们筑起一座朴素的石碑。由于无从知晓英雄们的姓名，钟宜龙给他们刻上了统一的名字——“红军”。

老人还用祖屋建起简陋的家庭纪念馆，陈列着一生收集的琐碎资料，“现在的和平是这些人拿命换来的，至少要给英雄后代们一个交代，不能让他们被历史淹没了。”

而在最悲壮、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由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断后任务，他们走在队伍最后，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全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和大队部队过湘江，以一兵兵力阻击数倍敌人的无数疯狂进攻，全师6000多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这段历史如今被制作成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董亚春说，执导该剧，一是出于对红三十四师革命英雄的崇高敬意，二是出于教育年轻一代铭记历史的重大责任。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踏上长征路的近3万福建籍红军仅剩2000余人。“宁化仅存58人，数千红军魂落他乡。”张族进说，“宁化石壁镇石壁村90多户人家有90多名革命牺牲的烈士”。

是什么让闽西儿女如此义无反顾？
“一种说法是，农民有如此大的革命热情，是因为分到了土地的感恩之心。”钟健英说，其实不然，“是人民和党、红军成了共同体，有了血肉鱼水情”。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郑重宣布闽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亘古不变的社会旧秩序被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条例彻底推翻。

恽代英在其《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写道：“在苏维埃政府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著渣的贫农都改

吃白米……疾病可以找到公共的免费的医生和很廉价的药品……妇女解放了一切社会与家庭的约束压迫，获得了一切的自由。”
“共产党真正好了，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931年参加红军儿童团的96岁老红军林攀隆这样告诉记者。

长征精神滋养红土地

闽西人，已将这份珍贵的长征精神放在了灵魂深处。

27岁的长汀县南山镇文化馆工作人员赖富家选择在中复村红军旧址做一名义务解说员，讲着家乡那“千遍万遍也不厌倦”的红军长征故事。

赖富家指着一条古街告诉记者，这条街曾为红军提供了大批物资，因此被称为“红军街”。沿街漫步，依稀可见一些木屋里贴有“缝鞋工会旧址”“消费合作社旧址”等木牌。

当战争的硝烟远去，曾经的红军街，如今开始主动拥抱互联网和大物流时代，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街”。充满红色气息的红军街上，成排的淘宝店把当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往大江南北。

“我们还将发展农村电商和扶贫相结合，带动当地农民一起致富奔小康。”长汀县文化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曾驻中复村第一书记钟彬彬告诉记者，比如土特产姜，电商无偿提供姜种、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服务，由贫困户种植，再由电商订购回来，价格超出市场价10%以上。

闽西人，已将长征精神化成了一种格外的自觉。

“我骄傲，我是红军的后代。”林海鑫从厦门集美体校毕业后，选择建筑行业，生意越做越好。

“听着长征故事长大，事业有成后更是热心传播红色文化。”林海鑫说，“家乡有这样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是我们创业路上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明福特科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恒标于5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宁化创业，他自称为“事业扶贫”。他说，祖辈曾经有很多人参加过红军，这种精神一直伴随着自己的创业之路。

在聚集资金、掌握技术之后，黄恒标希望带动更多的贫困家庭脱贫。“未来公司可以招三千人以上，每人平均一年工资5万元。”黄恒标说，员工在家乡就业，不仅可以赚到钱、学到技术，还可以照顾老人孩子，回家乡发展事业。

闽西人，开启了脱贫致富的新长征。
距离三明福特科光电有限公司不远处，粉墙黛瓦马头墙，小桥流水傍人家，稻田翠绿频“点头”，这就是宁化县石壁镇杨边村。两年前，这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村还是“房屋低矮杂乱、河塘沟渠污水熏人”的模样。

“省里十分重视革命老区的发展，是党的好政策让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驻村第一书记钟常永说，向省里筹集了3000万元用于美丽乡村建设，有了今天的“杨边”。

记者看到，村里建起了现代农业观光园，开展土地入股分红，村民当起了村里观光项目的股东，生态农业致富的同时，更让村庄成为了“景区”。

“尽管这段闽西长征历史少为人知，但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了闽西儿女的血脉里。”钟健英说，福建正在进入红色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与传承，让这段历史为全国人民所知晓、所熟知，补上红军长征历史上的这个重要篇章。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 童方

以行军艰难著称的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究竟艰在哪里、难在何处？记者近日走进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部分雪山草地，感知当年红军克服人类体能和生存极限的英雄壮举。

根据四川省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的史料，中央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昌德山、打鼓山5座海拔4100米以上的雪山，加上红四、红二方面军，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翻越的4000米以上的雪山多达67座。

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以后红四方面军又两过此山。夹金山主峰海拔4260米，山顶终年积雪，天气变化无常。当地有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畜不敢攀，要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从宝兴县硃砂坝出发率先翻越夹金山。如今的硃砂坝，依然流传着许多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爱民助民的故事，保留着红军宿营经过的“凉水井”“誓师坝”等遗址。

当年提了一盏马灯主动给红军带路的藏族向导莫日坚，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如今在硃砂坝木垒风景区工作的马花是马灯红的孙女。马花告诉记者：“爷爷生前多次讲述，红军一早就从蚂蝗沟旁的小路开始爬山，爬到半山腰的一支箭、五道拐等地时，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雪越来越深，天气越来越冷，空气越来越稀薄，前面的战士用木棒、刺刀挖着路脚孔，后边的队伍相互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这时人已累到了极限，快到山顶时还遇上了冰雹，有些战士没有防备，跌倒了，滑下山去，就再也找不到了。”

尽管81年后的夹金山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皑皑积雪已经少见，但驱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特别是站到山顶万母寨坝口回望山下，盘旋曲折的山路依然令人感叹：当年衣衫单薄、草鞋履地、靠辣椒水御寒的红军，身上蕴含的是什么样的精气神！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

1935年6月12日至18日，中央红军分批陆续翻越夹金山，在四川省小金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度过了雪山的艰险，还有被称作陆地“死亡之海”的草地在前方考验着红军。红军走过的川西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每年5月至9月正值雨季，草地沼泽泥潭无路可行。

1935年8月、9月，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三次过草地。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腹地，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走原路。穿行在高原原瓦切镇的日干乔国家湿地公园，县党史办办公室主任贺建军告诉记者，红军过草地主要体现在“四难”：

一是行路难。草甸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堪称“魔毯”。沼泽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如果被这些泥浆泡过，就会红肿溃烂。一旦下雨，脚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会掉进泥沼。

二是食物难。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走了一半或不到一半。接下来的路程红军就得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腹泻，重则中毒致死。

三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红军战士过草地时，大多穿单衣，穿草鞋，甚至赤脚也不少。有老红军回忆说，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

四是宿营难。草地到处是泥泞淤水，一般很难夜宿。在草地里露宿往往要两人或几人背靠背，才能增大面积避免陷下去。多位老红军回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气候寒冷，高海拔缺氧，次晨就会发现一些战友已经停止了呼吸，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休息的战友也牺牲了。

中共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校长、全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承先说：“在这种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红军将士不但要经受严寒、饥饿、高山反应等极限身体考验，还要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指战员官兵平等、团结友爱、舍己救人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他们能够胜利翻越雪山、走出草地，证明了这是一支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真正支部建在连上、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人民军队。” 新华社成都电

走进雪山草地感知红军挑战人类极限